

未做出显著的成绩，却在1944年秋冬之际，突然不辞而别，全体返回东京。原因何在，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他们这些带有资产阶级自由色彩的艺术家们，一定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和甘粕的“军刀”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反映出甘粕对满映改革的失败。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甘粕正彦服毒自杀。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26辑。)

石井四郎秘闻三则

吕兵

石井四郎(1892—1959年)，臭名昭著的日本细菌战犯。1892年6月25日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伏见街(现芝山街)。1920年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1924年4月再入京都帝大研究生院学习和研究细菌学、血清学、防疫学和病理学。1926年毕业，从军，曾任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日本侵华第一军军医部长等职。日本投降后，他逃回日本，将有关细菌战资料送予美国，受到美国庇护，未受法律制裁。至今，世人公认他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元凶，但有关他在中国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具体罪行尚未全部披露。为此，笔者依据档案史料，略举秘闻三则，聊以示众。

一 石井四郎与渡边博士

渡边博士原是日本神奈川县立卫生实验所所长。1939年至1940年间，他却成为石井细菌部队菌苗班班长，参与用活人试

验超声波疫苗的罪恶活动，由学者变成杀人刽子手，这一变化完全是石井四郎一手导演的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

1937年左右，渡边博士发明了用超声波发生器制造、改良菌苗的新技术，可以提高菌苗的产量与免疫能力。这引起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石井四郎的重视。他几次前往卫生实验所了解渡边博士的研究情况，发现这项新技术能弥补细菌战研究的空白，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圈套，把渡边博士诱入了魔窟——石井部队。

1937年，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新设置了“超声波研究室”。防疫研究室建于1932年8月，是石井四郎在日本国内从事细菌战研究的基地。此时他在该室设超声波研究室是企图利用齐全的实验设备，充足的实验经费诱惑渡边，让他进入自己的“权力范围”，进而达到迫使渡边为其细菌战研究计划服务的最终目的。这一阴谋很快就得逞了。1938年7月，渡边博士欣然接受石井四郎的聘请，任军医学校嘱托，迈出走向魔窟的第一步。

渡边受聘后，每天上午还在卫生实验所工作，下午就与山内助手到军医学校进行研究。他们研究的课题是用超声波改良霍乱菌苗。大约经过半年，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他们研制的超声波疫苗经过80人接种试验，效果比军医学校原制菌苗要好。于是石井四郎用军部命令强迫渡边博士与助手辞去了卫生实验所的职务，专职军医学校。

1939年，正当渡边博士准备继续攻克超声波疫苗人体注射反应过大课题时，石井四郎又逼近渡边，胁迫他去哈尔滨石井部队完成下一步研究工作。渡边当时听说石井部队十分神秘，易进不易出，心里不愿去。石井则为达到最终目的极力劝说他。最后，石井对渡边说：“如果实在说不通你，那以军部命令你去研

究如何？”渡边说如果去大连卫生实验所就去。石井又要一个花招，说：“可以，但先去哈尔滨。”渡边与助手山内迫于当时军部的压力，听信了石井的话，抱着将来去大连卫生实验所的希望，于1939年6月离开日本，踏上赴中国哈尔滨的路途。

渡边博士与助手到达哈尔滨时，石井部队正在扩建，实验设备不全，超声波疫苗的研究无法进行。石井把渡边安排在第四部任菌苗班班长。石井部队当时下设八部，第四部是生产部，负责生产细菌。菌苗班则负责供给关东军细菌作战所需之细菌，包括：伤寒、副伤寒、赤痢菌苗、霍乱菌苗以及流行性脑膜炎菌苗等。当时该班成员17人，定期生产60万人份细菌，这些细菌三个月后即失效，需重新制造。

1939年5月，诺门罕事件爆发，石井部队组成细菌作战队赴前线进行细菌作战。菌苗班被抽出5名班员，剩下人员在渡边率领下生产细菌。由于当时生产任务极重，石井把安东洪次^①等派到该班帮助生产细菌武器。但是，石井作战队在战斗中受到苏军沉重打击，石井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滤水车亦被击毁，他们撒布的细菌污染了战区附近的河流，结果玩火者自焚，疫病在日军中蔓延。10月初，石井部队成员悻悻而归。10月末，北满孙吴（今黑龙江省孙吴县）等地发生病源不明之热性传染病。石井派渡边组成了调查班，渡边任班长，经过约三个星期的调查未取得成果。

1940年3月，超声波发生器等实验设备安装调试完毕。石井四郎下令进行人体实验。为此，菌苗班组成人体实验班，班员有川名技手、千叶技手、小林囃托、渡边博士与山内助手等。渡边博士与山内助手负责生产超声波霍乱疫苗。

^① 细菌战犯，大连卫生实验所所长，战后回日本。

5月，人体实验开始。他们把受试验的20名中国人分为三组。一组，8人，注射超声波霍乱疫苗。二组，8人，注射军医学校制霍乱菌苗。三组，4人，未采取任何防疫措施。大约二星期后，又让上述20人喝下混有霍乱生菌的牛奶，这种毒菌是石井部队培养的剧毒菌，对人致死量是1/千毫克，当时使用的感染量是1/500毫克。结果，“一组8人中仅有1人稍有头痛和腹痛，3天后复原。二组8人中多数患下痢，并有3人病情严重，死亡1人。作为对照的第三组4人，全部死亡。”^①

石井四郎得到试验报告后，将结果呈报关东军军医部，建议采用超声波疫苗做为细菌战时保护己方的“武器”，被采纳。于是石井下令大量生产超声波霍乱疫苗。可渡边博士与助手山内还想去大连，就以设备不足为由，提出去大连制造菌苗的要求。石井不同意，要求他们利用现有设备生产。渡边看出石井不愿让他们去大连，原来的允诺成了口头支票。为此，渡边几次与石井发生冲突，矛盾开始激化。最后一次，也是危及渡边生命的一次，发生在1940年9月。当时，长春发生了鼠疫，石井部队开始防疫。石井令菌苗实验室不停地生产防疫疫苗。但因生产被拖延，石井从长春打电话询问疫苗生产情况，得知疫苗未制造出来，就叱责了渡边，并令渡边去长春。当夜渡边赶赴长春，住于大和旅馆。据他的助手山内说：“第二天，听说渡边博士在长春大和旅馆前因交通事故而死，但我却总怀疑。我根据石井四郎的为人，知道他对下级能使用各种残酷手段。”^②结果，渡边去大连研究超声波疫苗的愿望成为泡影。

① 参见山内自述。

② 山内自述。

二 石井家族的不义财

获原英夫是石井四郎的同乡，又是远房亲戚，他的叔父是石井家的女婿。1934年左右，石井四郎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建筑细菌研究所，他把家乡大约20名青壮年招到满洲帮助建设。获原的叔父石井正雄、舅父青柳雄等都作为其中一员来到了伪满。他们在伪满大约一年间，获得了大量钱财。然而，其中最突出的是石井的亲戚铃木茂。他开始仅是做日工的木匠，后来却逐渐成为承包石井细菌研究所建筑工程的组长。

1934年夏，几名关押在细菌研究所的抗日人员逃出虎口，这引起石井四郎不安，他怕自己的罪恶活动暴露于外，立即把该研究所迁到哈尔滨南岗。1936年，日本天皇下令建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任部长。1938年，关东军下令在哈尔滨市郊平房建筑“聚毒特区”，作为石井部队研究、生产细菌武器的基地。石井四郎又从家乡招募了两批人员，充实铃木组，安装四方楼^①内的各种设施。

获原英夫是第二批来满洲的人员，他参加了四方楼第七、八两栋内部安装工程。此项工程使他获得了“可观收入”。1937年8月、9月间，获原同其他20名应募者一起，在东京都牛道区军医学校参加考试，被录取（考试只是形式）。1938年他们一行20人来到伪满。到伪满后，他们在第七、第八栋工作。当时建筑物的内部只有入口处和最里面间隔着房间，中间像个大礼堂，没隔断。第七、八栋被三、四、五、六栋所包围，从外面完全看不到。入口处有一坚固大铁门。在三、四、五、六栋三楼的角上都装有探照灯，直接射向七、八栋。三栋的房顶

^① 即石井部队的实验楼，因形为四方称为四方楼，其第八栋是关押供实验用的活人的。

上还建有更高的了望台。

他们开始干活前，建设班工藤技术员传达了石井部队长的命令：“七、八栋的内部工程今年内（1938年）必须完成。有关业务问题，同部队的任何人都不许议论，如有人议论，必予处罚。”^①随后，他们开始刷第八栋内已间隔好房间的墙，并准备间隔其它房间，这是他们第一项工作。根据石井的指示，凡出入第七、八栋的人必由保密班（为保密而设立的机构）检查证明并搜身，木工和瓦工负责人则每天必须将内部设计图交给保密班保存。获原的舅父青柳是这20人的负责人，他当天要向保密班报告到工地干活的人数、作业种类和地点。

但由于石井部队没按合同规定把获原等算为部队职工，只给他们临时工的工资（获原的日工资是2元8角，这是杂工中最低的），因此他们怠工，致使工程没有进展。后因二期迫近，铃木请示石井同意，又从家乡招了40名工人，参加七、八栋的内部施工。这40人于当年4月到达伪满。至此，千叶班人数增至60人。青柳仍继续任千叶班长职务。

第二梯队到哈尔滨后，开始承包，工程有了一定进展。获原说：“我们将七、八栋一、二楼的28间房的墙壁刷好后，开始隔监狱。在此之前，曾在五常石井部队工作过的人，似乎也不知道七、八栋的用途。我是在二三个月后才听青柳说这是收容试验用活人的监牢，牢房入口有铁门，四周是水泥的，每间牢房都有厕所。1939年，七、八栋牢房基本完成。”^②

第二项工作是搬运、组装各种研究器材。如安装在三栋一层的灭菌器等。

通过承包，获原等每天有十至二十元收入。有的收入多达

① 获原供词。

② 获原供词。

三四十元。获原说：“我刚来哈尔滨时，扣去每月二十元伙食费，再往家里寄五六十元，手中就没多少钱了。后来，我每月寄家一百元，还可添置西装等衣物。而且，星期天去哈尔滨时，我也可以出入妓院、咖啡馆。生活富裕了。我前后（1938—1939年）向家里寄了大约一千元。”^①

以上只是获原一人的情况。而铃木茂此时更富有，已“拥有家资十万！”^②石井四郎家的钱财更多。这些钱是石井四郎杀害中国人民而获得的不义之财，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

三 石井在山西的罪恶活动

1942年8月，石井四郎因贪污实验费被撤职，降级任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军医部长。任职期间，他为了防止细菌战中“自伤”日军，积极从事卫生防疫工作。他与助手曾多次举办训练班，提高军医的防疫水平。据战犯供认，石井四郎与助手渡边于1942年11月在太原举办训练班。由渡边讲授了病院内传染的预防办法，具体包括：病房及伙房的防疫设备、对水井的消毒办法、作战中对用水的检查法以及毒物检查法等内容。1943年4月初，石井四郎亲自到潞安（今长治市）陆军医院检查防疫工作，作了如下指示：“（1）令潞安陆军医院正确诊疗，让患者早愈，重返前线；（2）严肃军纪，进行精神教育；（3）军医需要进行医务学习，提高知识水平；（4）研究利用中药补充药源；（5）时刻注意防疫，提高防疫知识。”^③当时，潞安医院在石井亲自指挥下进行了防疫演习。演习内容是飞机投下鼠疫菌后的防疫。潞安医院组成了防疫队，采用石灰水进行消毒，以

① 获原供词。

② 获原供词。

③ 种村文三供词。

及在军营与仓库间堆放的破席上撒石灰等等防疫措施。

研究冻伤是石井的另一任务。战犯汤浅谦供称：“1942年12月，石井四郎亲到潞安医院进行巡视。当天上午，他召集军医讲授关于冻伤实验的结果。他说，过去冻伤用摩擦法不好。根据冻伤实验，凡冻伤严重到几乎心脏停止跳动时，可用37℃温水浸泡全身，即可复原……当晚，他又召集下士官以下400余人在司令部内看了有关诺门罕事件中防疫的电影。石井四郎现场说明了电影要旨。”战后，冈村宁次回日本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也供认：“（石井）在完成其本职工作外，从事特别研究的使命，并获得很多成果，特别对于治疗冻伤，他得出了用37℃水浸泡伤处是最好的结论。这些都是根据使用人体进行种种宝贵试验，或让他活，或让他死，或让他再生等等所取得的成果。”可见，石井当时关于冻伤的研究得到了冈村的赞赏与支持。

然而，这位从事细菌战的元凶，时时不忘其老本行，虽贬居山西，却仍利用一切机会从事推广细菌战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研究工作。石井到山西上任后（9月上任），首先就以太原防疫给水部作为试验中心，研究细菌战。1943年7月，石井在太原第一军司令部对参加太行山作战的军医们讲：“斑疹伤寒怎样传染？从前有人说是从口内传染，实际上是虱子传染，是患者在抓痒时，使细菌进入皮层内致病。”他还说：“这在太原防疫给水部用中国人作过斑疹伤寒试验予以证明的。”据当时有关人员讲：“太原防疫给水部的业务由石井亲自指挥。其中大桥和野口两人由石井直接指挥，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另外，他还上窜下跳四处传播细菌战理论。1943年3月，石井四郎到山西崞县给下士官讲述了“疟疾传染情况”，并放映了日军攻打上海时部队患病情况的电影。4月和9月，石井又两次窜到潞安，讲述了用发霉的芋叶与小麦里的黑痘病菌混合培养的比尔斯菌的作

用，并阴毒地说：“如果天皇一旦有令，我们马上就可以将这种细菌撒在美国，来年将寸草不生”。

正是在石井四郎的宣传鼓动下，山西日军在垂死前多次向我人民使用细菌武器，造成严重损失。如战犯×××供称：“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我在太原市西洋市北支派遣军直属部队防疫给水部工作。在河南作战时，日军在新乡一带以救济为名把伤寒菌掺入白面，杀害了很多中国人民。”又据种村文三供认：“1944年4月，在潞安陆军病院任卫生准尉时，我在潞安西南约6公里的某村北边井内投过伤寒菌。经过15天后，听说得伤寒的老百姓有30名，其中3名死亡。”战犯五十岚猛供述：“1945年7月上旬，我在山西曲沃县城外驻扎时（第114师团直辖炮兵大队本部）……把从临汾县城部队司令部情报室领来的高热剂和下痢的毒品，扔到东头井里和村中的水井里。”

1944年夏，日本侵略者日薄西山，石井奉命离开山西回日本，筹组细菌战总部，这才结束其在山西的罪恶活动。

毒辣阴险的“御用挂”吉冈安直^①

袁新觉罗·涛杰

一、他与溥仪的关系

他是在“九·一八”的前四五年，就在日寇驻我国天津的军队里任中下级的军官，从那个时候起，就与溥仪相识。在他由天津回国以后，便在日本鹿儿岛的联队里任大队长。1930—

^① 这是涛杰1954年对吉冈安直的揭发材料，标题为编者所加。